

从虎林山墓地出土陶尊看苦寨坑窑址的年代*

付琳

(厦门大学历史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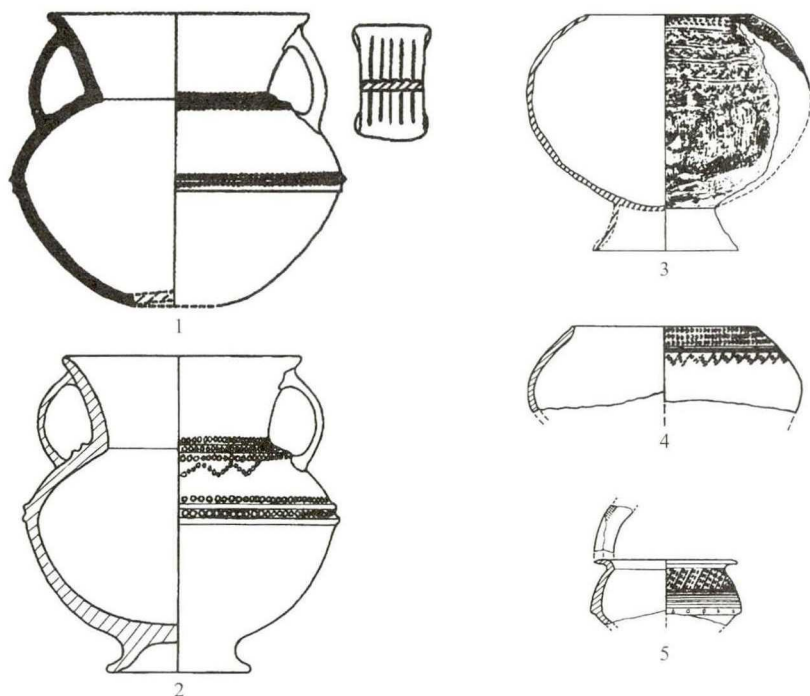
在福建永春县苦寨坑和德化县辽田尖山发现烧造原始瓷的窑址群，是闽南考古一次重大收获，因出土窑炉形态近乎龙窑，原始瓷产品类型特征独具特色，窑室测年样品数据相当于中原地区夏商时期，而倍受瞩目。其中，苦寨坑窑址入选“2016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但由于窑址考古缺乏完整器出土，闽南地区夏商阶段考古学文化面貌又不甚明朗，导致学界对于苦寨坑及辽田尖山窑址群的年代认识存在较大分歧。实际上，属于苦寨坑和辽田尖山窑址群的产品早在20世纪50年代林惠祥先生带领厦门大学历史系师生做考古实习时，在永春县境内即已调查发现，当时便指出这类釉陶器形状特别，花纹不是用印模印成，而是用尖物刻划而成，在福建别处尚未发现。限于当时的考古资料，林先生对于这批遗物给出了相对宽泛的年代认识，认为“应是接在新石器时代之后，相差不太远，或者是已入了铜器或铁器的时代，可能到了汉代”^[1]。本文基于对福建漳州虎林山M16填土中出土陶尊，及邻近地区零散出土的可能属于苦寨坑及辽田尖山窑址群产品的初步分析，谈谈对于此处窑址群年代及相关问题的认识。

一、虎林山墓地出土陶尊的年代及邻近地区的相关发现

虎林山位于福建省漳州市东北郊，是一座距九龙江不远的小山丘。2001年，福建博物院等单位在虎林山遗址发掘墓葬20座，其中大部分是浮滨文化墓葬。虎林山M16是一座带腰坑的竖穴土坑墓，随葬遗物34件，填土中还出有部分残陶器^[2]。虎林山M16填土：6是一件硬陶尊，这件尊与该墓及同墓地所见浮滨文化陶器风格差别较大，器形、纹饰和制法与在苦寨坑及辽田尖山窑址群发现的原始瓷产品有密切关系。鉴于目前十分缺乏出土类似遗物且年代较为明确的考古单位，虎林山M16填土：6便成为了分析窑址产品年代的一条关键线索。该尊侈口、圆唇，高领，扁腹圆折，底残，推测为凹底，也不排除原本有圈足的可能。器口外至上腹部两侧附对称的宽桥形鬃耳。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江南地区周代墓葬与文化分区研究”(18CKG009)阶段性成果。

上腹近颈部饰三周平行排列的戳印联珠纹，腹部转折处有两道凸棱，在第一道凸棱及两道凸棱之间各饰一周戳印联珠纹。鬲耳表面饰竖向的凹弦纹。口径 14、腹径 18.2、高 16.2 厘米（图一，1）。



图一 闽南及闽江下游地区出土的早期原始瓷

1. 漳州虎林山 M16 填土：6 2. 南安边庵山采 3. 永泰张限采：2 4. 泉州翠屏山 TG1 ②：5
5. 泉州翠屏山 TG1 ②：6

在闽南地区发现有两件零星出土的原始瓷尊与这件硬陶尊形制非常接近。其一采集于南安市福溪边庵山顶，现藏于南安市博物馆^[3]。该尊灰胎，器表施青黄釉。侈口、圆唇，高领，鼓腹圆折，喇叭状矮圈足。器口外至上腹部附对称的桥形宽鬲。领腹交接处和腹部转折处各有两道凸棱。在颈部凸棱两侧饰三周戳印的联珠纹，其下另戳印一周呈锯齿状排列的联珠纹。在腹部第一道凸棱之上及两道凸棱之间各饰一周戳印联珠纹，下腹饰条纹。鬲耳表面饰竖向凹弦纹。口径 12.4、腹径 16.6、足径 7、高 16.6 厘米（图一，2）。另一件采集于泉州市丰泽区鹧鸪山，现藏于泉州市博物馆^[4]。该尊器形基本同于边庵山尊，但纹饰略有差异，从公布的照片来看，颈部只有三周平行的联珠纹带，其下缺乏呈锯齿状排列的联珠纹带。此外，1958 年在永春县茶心山采集到过一件原始瓷双耳尊，从公布的照片和文字描述分析，可能是同类器物^[5]。

上述这类双耳尊均出自闽南泉州、漳州一带，形制接近，应为同一时期的遗物。出自虎林山 M16 填土中的这件尊，因有明确的出土单位，可做年代考察与推定。发

掘者将 M16 归入虎林山墓地第三期, 同期墓葬有两个测年数据, M13 测年样本年代为距今 3040 ± 60 年, M18 测年样本年代为 3120 ± 80 年, 因之将该期年代断为距今 $3200 \sim 3000$ 年。干小莉将虎林山 M16 归入九龙江流域商周文化遗存第五期, 早于属于第六期的虎林山 M13 和 M18, 年代推定为商代中晚期^[6]。总体而言, 两者对于虎林山 M16 的年代认识差别不大。不过, 干文将 M16 填土中出土的这件尊与 M16 随葬品归为一期, 似需斟酌。第一, 在层位上这件尊出自虎林山 M16 填土内, 年代可能会早于 M16 本身。第二, 虎林山 M16 是一座浮滨文化的典型墓葬, 但这件出自填土的双耳尊却非浮滨文化常见的陶器器形, 与浮滨文化典型的大口平底尊和大口圈足尊风格迥异。

笔者认为这类尊的流行年代很可能早于浮滨文化。从形态来看, 这类尊与以漳州松柏山墓地 M1~M6 和虎林山 M2 为代表的松柏山类型常见的圈足尊形态比较接近, 区别在于松柏山类型的尊多为夹砂陶, 缺少双螯耳, 流行装饰刻划的网格纹。陈兆善认为松柏山类型的年代在商代晚期偏早或中期偏晚阶段, 在距今 3250 年左右^[7]。干小莉认为松柏山类型年代可定在夏代前后至早商时期, 属于该阶段的南靖县乌仑尾 M2 墓底采集炭样测年数据为距今 3550 ± 60 年^[8]。鉴于松柏山 M4 出土的黑衣陶垂腹罐形制近同于闽北地区马岭类型晚期的同类器, 笔者认为松柏山类型的年代已进入早商时期应无问题。故而, 更倾向于推定这类双耳尊的相对年代处在松柏山类型和浮滨文化之间, 将之绝对年代定在早商与晚商之际比较合适。

除了这类双耳尊以外, 闽南及闽江下游地区还有一些零散出土的, 完整或可辨器形的原始瓷器, 应当和苦寨坑及辽田尖山窑址群有密切关系, 很有可能是其产品。主要有在永泰县张限遗址采集的原始瓷盂, 灰白胎, 青釉, 大部分釉已剥落。敛口、尖圆唇, 鼓腹, 圈底近平, 矮圈足。近口沿处钻两个圆孔, 下腹近底部有一道凸棱。近口沿处戳印两排月牙形点状条带, 其下弦纹与由刻点组成的曲折纹带相间, 下腹部的条纹模糊不清。口径 8.5、腹径 14.3、足径 7.3、高 12.6 厘米(图一, 3)^[9]。在泉州市丰泽区翠屏山遗址出土的原始瓷盂残片 TG1 ②: 5, 灰黄胎, 青釉较薄。形制与张限盂相似, 施纹手法亦同, 仅在纹样的排列组合上有所差别(图一, 4)^[10]。翠屏山遗址还出土一件原始瓷小罐 TG1 ②: 6, 灰黄胎, 青釉较薄。侈口、平折沿, 束颈, 腹部圆折, 转折处有一道凸棱。沿面饰两周戳印的长点纹带, 腹部刻划斜向成组的长点纹和折线纹, 在凸棱上戳印一周联珠纹(图一, 5)。

二、苦寨坑与辽田尖山窑址群的产品类型与年代

苦寨坑窑址位于永春县介福乡紫美村西南面的一座山坡上, 辽田尖山窑址位于德化县三班镇三班村南部辽田尖山山坡处, 两处窑址实际仅相距约 200 米, 属于同一处窑群。经 2014~2016 年福建博物院等单位考古发掘, 在辽田尖山清理窑址 8 座、苦寨坑清理窑址 9 座, 窑址类型及出土遗物基本相同^[11]。辽田尖山窑址 2014 年度的考古

发掘已有简报公布,对于清理的四座斜坡式龙窑,发掘者从地层关系入手,指出Y1早于Y2,Y2早于Y3、Y4。出土的原始瓷未有可复原者,可辨器形有钵、罐、器盖等,还有部分口沿、领部、折肩、圈足、鏊耳、器柄残片。装饰手法主要有刻划、拍印、戳印、堆贴等,纹饰主要有弦纹、条纹、网格纹、方格纹、联珠纹及由长点或月牙形点组合排列的平行或曲折形条带。简报发表时没有碳十四测年数据,发掘者根据与以往福建、浙江等地发现的土墩墓和遗址资料进行比较,认为窑址年代上限不会早到商代,下限未晚到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故将窑址年代推断为西周早中期^[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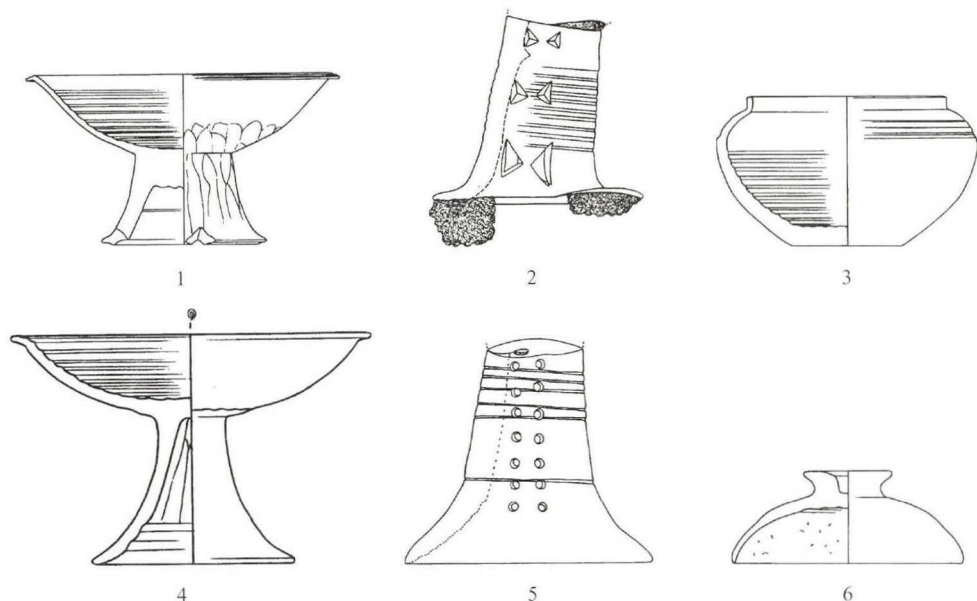
此后不久,羊泽林在相关文章中披露苦寨坑和辽田尖山两处窑址共采集碳十四测年样品15个,经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测试,年代均处在距今3770~3400年之间^[13]。其中从苦寨坑窑炉采集的8个炭样测年,最早为公元前1749年,最晚为公元前1497年,测年数据最早相当于中原地区夏代中期,最晚也在商代中期,是我国目前已知烧造最早原始青瓷的窑址之一^[14]。不过,有学者仍认为从苦寨坑和辽田尖山窑址群原始瓷产品的器形、装饰及胎釉特征来看,其时代应为西周早期^[15]。

苦寨坑和辽田尖山窑址群出土的原始瓷,一部分为灰胎,质硬,施青绿釉,常见凝釉和脱釉现象。还有一部分为灰白胎,质较软,釉色黄绿,釉面多剥落严重。在器形方面,以圈足器为主,也有圈底、凹底器,基本不见平底器。虽缺乏完整器,但从大量可以反映器形特征的残片观察,产品种类可能较为集中,大宗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大高领、折腹、高圈足的尊,从残片分析这类尊的器体应有大小之别,领部、腹部和圈足多饰由刻点或短线组合排列的曲折纹带,折肩上有的附桥形鏊耳,部分还在其一侧继续贴塑条状的“几”字形假耳^[16],也有在腹身贴塑条状扉棱的。这类瓷尊在莆田市仓仔山残墓出土过一件完整器^[17]。第二类是敛口、圆腹、矮圈足的盂,腹部多饰由成组刻点组合排列的曲折纹带、戳点纹等,或与条纹相间,圈足多素面,完整器应近同于永泰张限盂。第三类是圆折腹、口外连出双鏊的矮圈足尊,一般在领腹交接及腹部转折处饰戳印或用泥饼堆贴联珠纹带,有的下腹部还饰条纹,圈足多素面,完整器应近同于南安边庵山尊和泉州鹧鸪山尊。

苦寨坑和辽田尖山窑址群原始瓷产品的装饰手法很有特色。在纹样上,有一类戳印或堆贴小圆点组成的联珠纹带、曲折纹带,或密集戳印、堆贴小圆点形成的锯齿形图案。还有一类用尖状工具戳印、刻划长点或短线组成几列平行的曲折纹带。在装饰上,器身常见凸棱、鏊耳,还见贴塑条索状扉棱或假耳的。上述装饰手法较为繁缛,如按江浙地区商周原始瓷器装饰风格的发展规律来看,很容易给人造成年代偏晚的印象。笔者认为苦寨坑和辽田尖山出土原始瓷的器形和装饰风格,容待专文探讨,有可能受到过商代青铜礼器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其中间媒介或许在赣江、鄱阳湖地区。除前文介绍到零星出土的完整器外,这种类型的遗物目前还在闽南地区的安溪县晒牛山遗址、形墓头遗址,永春县山仔遗址、吴山遗址,南安市蜘蛛山遗址^[18]和闽江下游地区明确采集到,最远见于闽江口外平潭岛的壳丘头遗址。从发现数量初步分析,

其流行区域以晋江流域为主,对以南的九龙江流域和以北的闽江下游及沿海岛屿有所影响。

大致与苦寨坑和辽田尖山原始瓷窑址群的产品同时或略早,在太湖南岸的东苕溪流域也发现有商代原始瓷窑址群落^[19]。但两地原始瓷产品的器形和装饰风格迥异,应属于不同的系统,暂未见到明显的交流迹象。以浙江湖州南山窑址第三期即早商晚段的产品为例,器形主要是高圈足弧腹豆、平底或凹底的盂、小罐和器盖,尤以豆为大宗(图二)。装饰风格上,以素面为主,纹饰主要有弦纹和少量刻划纹。有的在豆把上装饰成组的圆形或三角形镂孔,有的足缘带三个三角形缺口。东苕溪流域原始瓷器的发展序列相对成熟,从大量窑址和墓葬的发现,基本可以串联出夏至战国时期这一区域原始瓷的发展情况。值得注意的是,自本区创烧原始瓷以来,直到西周晚期原始瓷豆开始逐渐被原始瓷碗替代之前,豆一直是东苕溪流域原始瓷产品中的绝对大宗,这与闽南地区苦寨坑和辽田尖山窑址群以烧造原始瓷尊类器为主形成显著差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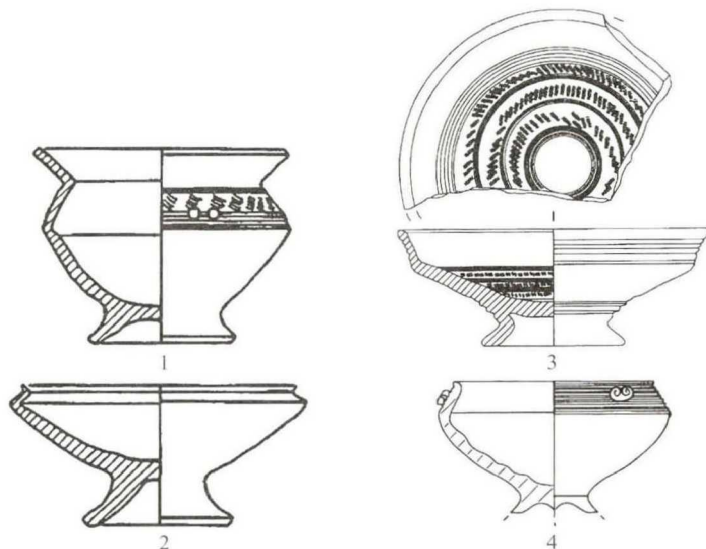
图二 东苕溪流域湖州南山窑址早商时期的原始瓷

1. IT302 ⑤ : 10 2. IT302 ⑤ : 14 3. IT302 ⑤ : 45 4. IT404 ⑦ : 6 5. IT302 ⑤ : 56 6. IT302 ⑤ : 92

进入周代,东南地区的原始瓷业得到长足发展,武夷山东侧的福建地区亦不例外。这一时期在闽江流域、闽东、闽南地区都有较多原始瓷发现。在闽江上游的武夷山市竹林坑窑址、车后窑址^[20]发现的西周早期至春秋早期的原始瓷窑址群,闽江上游浦城县管九村发现的西周春秋的土墩墓群^[21],及光泽、武夷山、建瓯、建阳、政和等地的土墩墓,武夷山市葫芦山遗址第三期遗存^[22]中都有同期的原始瓷器发现。所见原始瓷多为江浙地区常见的器形,有豆、碗、盂类盛食器和部分尊及鼓腹罐,鼓腹

罐器形与江浙土墩墓常见者相似，但釉下多施纹，如叶脉纹、小方格纹、席纹等，与钱塘江上游地区更接近。还有部分原始瓷筒腹罐，釉下亦拍印席纹，与本地的印纹硬陶筒腹罐有密切关系。从竹林坑窑址群的发现情况来看，大多应为本地烧造。闽东地区宁德市霍童芦坪冈遗址^[23]出土的一部分原始瓷豆形制同于竹林坑窑址，还有一部分与浙南沿海黄岩小人尖土墩墓出土的相同，一方面显示出闽江上游原始瓷业与沿海地带存在密切交流，另一方面则指示出闽东、浙南沿海一带可能也有本地的原始瓷窑业。

在此前有苦寨坑和辽田尖山窑址群早期原始瓷产品分布的闽南及闽江下游地区，进入周代后也接受到新兴风格影响，所见原始瓷器形主要是豆、尊、罐、钵（图三），且原始瓷豆的形制基本同于北部地区。在闽江下游的福州新店罗汉山墓地、闽侯县石山遗址第四期遗存、东张上层遗存、浮村下层遗存中都有相关发现，最近在闽侯芝山遗址集中出土大量原始瓷，同层炭样测年为西周早中期^[24]，遗物形制与闽江上游地区和江浙地区的同类器共性较强，但少量装饰风格应当与本区晚商阶段的黄土仑文化有继承关系。在闽清后门寨遗址还出土过形制可归属于江浙地区春秋中期的原始瓷碗^[25]，说明伴随北部地区文化因素的逐步南下，在闽江下游地区可能也出现了延续较长时段的原始瓷烧造活动。更重要的是，在闽南地区的晋江庵山遗址^[26]、南安尾仔山墓葬^[27]也出土有西周早中期的类似遗物，说明北部新兴的原始瓷因素至迟在西周早期已进入到了原本是苦寨坑和辽田尖山原始瓷窑址群产品分布的中心区域，这种替代现象可以作为苦寨坑和辽田尖山窑址群年代下限难以晚至西周的一条旁证。



图三 闽南地区及闽江下游出土的西周原始瓷

1. 南安尾山仔 (M1:1) 2. 南安尾山仔 (M3:1) 3、4. 闽侯芝山 (T2④:7、T4⑤:1)

三、结 语

苦寨坑和辽田尖山窑址群出土原始瓷产品的类型特征与太湖南部东苕溪流域商代、西周的原始瓷,及福建本省的西周原始瓷差别很大,难以用产品的直接比较来推定其年代。此外,苦寨坑和辽田尖山窑址群采集炭样的测年数据相对集中,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不宜全盘否定。从本文对出自明确考古单位的,很可能属于两处窑址产品的年代分析,将苦寨坑和辽田尖山窑址一类主要产品的绝对年代定在早商、晚商之际,应是合理的认识。至于窑址群存续年代的上限能否进入夏代?下限会否延续至晚商阶段?均有赖于本项窑址考古工作与研究的持续推进,也寄希望于闽南地区特别是晋江流域三代时期考古学文化序列的初步搭建。

自20世纪50年代厦门大学历史系和福建省文管会先后对永春县及邻近地区开展考古调查,发现这类特征明显的“釉陶”遗物,已过去六十余年。苦寨坑窑址的重大考古发现,再次将这批重要遗存展现在考古学家面前,是偶然中的必然。学者们对于苦寨坑窑址年代问题的讨论,当不在于证明谁是中国瓷器的源头,至少目前来看原始瓷器在多地起源的证据更为充分。在这一认识基础上,我们更希望探索的是瓷器起源的动力与模式,并进一步归纳总结其发展脉络和内在规律。除此之外,苦寨坑和辽田尖山原始瓷产品器形及装饰风格中一些可能受到商代铜器影响的因素值得大家关注,它对于闽南粤东地区浮滨文化的影响也应继续探索。

附记:蒙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羊泽林先生惠允,与黄运明、温松全先生观摩了苦寨坑、辽田尖山窑址出土遗物标本,又承黄运明先生惠示莆田仑仔山墓葬的新发现,在此并致谢忱!

注 释

- [1] 林惠祥、庄为玠、陈国强、吕荣芳:《1956年厦门大学考古实习队报告》,《厦门大学学报》1956年第6期。
- [2] 福建博物院、漳州市文管办、漳州市博物馆:《虎林山遗址》,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3年,第61~68页。
- [3] 福建晋江流域考古调查队:《福建晋江流域考古调查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78页。
- [4] 福建晋江流域考古调查队:《福建晋江流域考古调查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79页。
- [5] 永春茶心山尊的照片见于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闽南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考古》1961年第5期,图版壹,20。
- [6] 干小莉:《九龙江流域商周时期古文化分期初探——兼谈浮滨类型的年代》,《考古学报》2010年第1期。
- [7] 福建博物院、漳州市文管办、漳州市博物馆:《虎林山遗址》,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3年,

第 140 页。

- [8] 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漳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乌仑尾与狗头山——福建省商周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43页。
- [9] 福建省县石山遗址博物馆:《闽江下游流域史前遗址考古调查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79页。
- [10] 福建晋江流域考古调查队:《福建晋江流域考古调查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25页。
- [11] 羊泽林:《福建泉州辽田尖山、苦寨坑原始青瓷窑址》,《大众考古》2016年第11期。
- [12] 福建博物院、泉州市博物馆:《德化县辽田尖山原始瓷窑址发掘简报》,《福建文博》2016年第1期。
- [13] 羊泽林:《福建泉州辽田尖山、苦寨坑原始青瓷窑址》,《大众考古》2016年第11期。
- [14] 羊泽林:《福建永春苦寨坑发现原始青瓷窑址——是我国目前已知烧造最早原始青瓷的窑址之一,为研究原始青瓷以及龙窑起源提供了新材料》,《中国文物报》2017年3月10日第008版。
- [15] 郑建明:《21世纪以来的原始瓷窑址考古新发现》,《文物天地》2018年第7期。
- [16] 福建博物院陈兆善先生较早即发现这种贴塑“几”字形假耳的装饰手法,被浮滨文化常见的深腹豆口部装饰所继承。
- [17] 福建博物院发掘资料。
- [18] 参福建晋江流域考古调查队:《福建晋江流域考古调查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0年。
- [19]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馆、德清县博物馆:《东苕溪流域夏商时期原始瓷窑址》,文物出版社,2015年。
- [20] 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武夷山市博物馆:《武夷山古窑址》,科学出版社,2015年。
- [21] 福建博物院、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福建浦城县管九村土墩墓群》,《考古》2007年第7期。
- [22] 福建博物院、厦门大学历史系、武夷山市博物馆:《福建武夷山市葫芦山遗址2014年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6年第2期。
- [23] 福建省博物馆:《宁德芦坪冈遗址发掘报告》,《福建文博》2000年第2期。
- [24] 福建省县石山遗址博物馆:《闽江下游流域史前遗址考古调查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362、365页。
- [25] 曾凡:《福建闽清永泰新石器遗址调查》,《考古》1965年第2期。
- [26] 福建博物院、晋江市博物馆:《福建晋江庵山青铜时代沙丘遗址2009年发掘简报》,《文物》2014年第2期。
- [27] 福建晋江流域考古调查队:《福建晋江流域考古调查与研究》,第232页,科学出版社,2010年。